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李鸿章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26.1081
LH2
C-3

5 丰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李鸿章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了大量努力，争

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一、世家子弟初入仕途	(2)
二、组建淮军镇压农民起义军	(19)
三、洋务思想的萌芽	(41)
四、制器与近代中国海防	(58)
五、开创留学之先河	(78)
六、政坛生涯	(94)
七、评价洋务运动	(129)

一、世家子弟 初入仕途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一个世代耕读之家。

合肥位于淮水与肥水的会合点，县境的东南面为巢湖。这里土地肥沃，塘水停注，旱涝保收。李氏家族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

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从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的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乏政治靠山，所以常常受到人家的欺凌。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字凤益，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况。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字庆庵，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又是县学习武的生员。他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之后，便不再存有功名进取的念头，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李殿华虽然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众多，家大业却不大，所以他能够分得的财产为数不多。家庭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但他坚持“耕读”之家的根本，一刻

也不放松对于子弟的督教课读。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本名文印，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1802年（清嘉庆6年）。李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同由父亲亲自督课，每当作文写成之后，父亲必先加以详细审阅，指出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李文安的天资“中下”，但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很能遏制邪欲，专心攻读。从而，李文安做学问的根基，就在跟随长兄这8年的时间里初步奠定下来了。李文安除了就学于长兄之外，还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人为师，学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的技巧。自1822年起，他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设馆授徒。从1825年开始，李文安一连数次参加江南乡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但他没有气馁，锐意进取，终于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是合肥李洪谟的女儿，一位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有6男2女，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节勤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心李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坦然以对：“我教各个儿子发愤读书，他们都能身体健壮高大而奋发向上，怎么会感到忧虑贫穷呢！”她的唯一的目的是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条件，让他们朝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拼搏。

李鸿章兄弟6人，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

哥哥李瀚章，又遵循父亲的教训，兼攻科举之业。然而，屡试科场不顺，但他一点也不灰心，终以其强毅的精神刻苦攻读，于1849年获得拔贡生，因其成绩优秀入京参加朝考得一

等，以知县分发湖南，先为永定知县，不久调益阳，改善化（今长沙）。1852年底，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在湖南倡办团练，不久李瀚章即投身曾国藩幕府，掌管粮台，很受赏识，累官至湖广、两广等总督。

李鸿章的大弟弟李鹤章，自少抱负不凡，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但他志大才疏，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上。1853年李鸿章随侍郎吕贤基回籍举办团练，李鹤章一同加入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官至甘肃甘凉道员。

李鸿章的二弟李蕴章，他在12岁那年患了眼病，不得不放弃通过科举门径步入仕途的打算，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秉承李家祖训“公直、和睦、勤俭”六字经，办事井井有理，免除了李鸿章等兄弟的内顾之忧。

李鸿章的三弟李凤章，资质中下，个性倔强，曾随父入京读书，但不刻苦，20岁时回江南应试不中，其后帮助父兄举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局做过事，终身没有做过官。但他对做生意很精通，当时芜湖十里长街中的店铺十分之七八都由李凤章所开，芜湖一市的贸易额，他一人独占十分之四五，成为李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李鸿章的四弟李昭庆，他在科举路途上也不甚得意，只好捐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后随李鸿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先后镇压过太平军、捻军起义，官至记名盐运使。

李鸿章有两个妹妹。长妹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嫁给同县张绍棠为妻。张绍棠的祖母是李鸿章的祖姑，两人原为表兄妹，属于亲上加亲。张家比较富裕，李鸿章兄弟年少时常常得其资助。次妹幼时喜读《纲鉴》，涉猎群书，善吟诗，颇负文名，著有《养性斋全集》。其夫为同乡费日启，后曾助李鸿章治军于

江苏，因功保升为江苏候补知府。

李鸿章生长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其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诸多因素，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经济状况的拮据，促使李鸿章知道生活的艰辛，刻苦自励，锐意奋发向上；政治地位的低下，促使李鸿章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意识；较为浓厚的家庭文化传统素质，又为李鸿章创造了着意功名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并且，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李鸿章 6 岁开始在家馆中读书，李文安既是他的严父又是他的良师。书房名叫棣华书房，又叫棣萼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环境异常优美安静，李鸿章在这里度过了 6 年的家学生活。堂伯父李仿仙是一位饱学之士，对李鸿章的督教也极严格。此外，李鸿章还曾受教于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这 3 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在应付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于 1840 年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时年 18 岁。此时的李鸿章，才华初露，心地高傲，自信心强。他在 1842 年写的《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中表示，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再接再厉，刻苦攻读，要作那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年青时就扬名于世的人物。1843 年，李鸿章经过了 3 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入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函催李鸿章入京，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

抵达京城后，李鸿章先住安徽会馆，后又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初次来到京城李鸿章，心志专一，并未被这里的繁华富贵的情景所吸引，正如他在给母亲李氏的书信中说：“我作客在此地，绝对不敢违背父母的教导而稍涉空泛华丽之中”。为了学业的长进，他在不久之后，便以子侄辈的礼节拜见了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自此，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指导之下学习经学和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技巧，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和思想、事业上的继承人。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人。他是清道光、咸丰年间权臣穆彰阿的门生，曾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讲习程朱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之学的刘传莹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即散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大夫阶层中颇有名气。从根本上说就是推行封建礼治，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辞章”之学，则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考据”之学即汉学中的严谨的方法论也可作为充实理学的工具，作为“明礼”的手段。总之，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曾国藩主张这四者相结合，认为如果突出以“义理”为先、为主，就能做到“克己”、“进德”，就能成为一种治国之方，并可以通过它来讲求“立志”、“修身”，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的这一套由对学术的解释而引发的“修己治人”、“处世治事”的思想观点，对李鸿章一生所起的影响是很全面而又深刻的。李鸿章曾自称为曾国藩的门下“传教习教之人”，是曾国藩“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

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当时，会聚在各地的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于北京九

条胡同三号组织了一个文社，慕曾国藩之名，请他担任社长。社里规定每个成员每月须交文章3篇、诗作8首。李鸿章于是通过这个文社，既与各地人士交游问学，又常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虽然不中，但其诗文却博得了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曾国藩的刮目相看。正如他在写给母亲李氏的信函中说：“初次参加京城会试，我以诗文受到了曾国藩教师的赞赏，因而正式拜他为师傅，从早到晚跟随他，寻求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在往后这两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在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又着意“习制科举之文。”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中2甲第13名进士，朝考后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寒窗苦读十数载，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并且当上了有利于做学问的京官，这对李鸿章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快事。3年期满，李鸿章在1850年庶吉士散馆时，以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起，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央一级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李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之学，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他的弟弟和侄辈。李鸿章也很喜好时艺文字。但与他的教师一样反对雕章琢句、内容空泛的文风，而对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著称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这种文体赞赏不已，把这两种文体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的解释是，“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无论在何时，都显现出当初的颜色。”而“苍松翠柏，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百年之内也不会凋落衰败。”李鸿章特别推崇唐代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这两篇文章。

认为前者“气盛”，后者“言之非常痛快”。他又指出，“《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这6部儒家经典都是记载传递儒家思想体系的书，后人对之加以遵循阐发，为文虽因时势不同而有文体上变更，但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总之，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就说过：“作文如果不是阐发儒家思想道德，那么有关群臣父子、上下尊卑等风尚的文章就不要勉强去作”。李鸿章生长在桐城派文论的故乡，且其历任教师如父亲李文安、业师徐明经、伯父李仿仙及座师曾国藩等人，都是桐城派文论的传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也就很自然了。

从上述所见，李鸿章青少年时期走的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也就是说走的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之路。这条路，就是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一整套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奋自己。这样，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死力维护，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性忠诚。本来，这是一条传统的路，一条稳妥的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迭，走这条路是没有风险的。然而，历史下行到了19世纪40至50年代，情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从这时起的100余年时间里，遭遇到了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外来文化的挑战，儒家文化也首次面对着一个无法应付的新局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就在李鸿章中进士、点翰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准备大显身手的19世纪50年代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打破了他的既定目标，把他推上了另一条人生轨道。

第一次鸦片战争大量的战费支出，战争失败以后巨额的赔款，都一齐强加在人民的头上。经五口通商、关税协定，外国商品自由地、日益多地倾销到中国，鸦片输入也逐年激增。这一切，都使白银如流水般涌入外国人的腰包，银贵钱贱的情况特别严重。人民用自己双手生产的物品卖钱换取白银纳税，又要遭受更深一层的剥削。加之，封建官僚地主趁伙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致使人员负担越来越沉重；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得无数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落他方，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生存，为了免于死亡，人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向封建统治者展开反抗和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最终又汇合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月，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县紫金山麓金田村爆发，克永安、攻桂林、破全州，连下道州、郴州，继而合围长沙，取益阳、岳州，进湖北，据汉阳、汉口，占武昌，以百万雄师顺江东下，夺九江、安庆、芜湖，只两年多时间便定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于1853年5月调兵遣将，西征北伐。尤其北伐军自扬州、浦口北上，经安徽、河南、北渡黄河，直指北京，使得大清王朝处于极度的风雨飘摇之中，封建统治集团乱了阵脚。于是，竭尽全力镇压农民起义，稳住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成为19世纪50至60年代官僚士大夫政治生涯的出发点和

终极目标。

当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无奈八旗和绿营兵因为长期的养尊处优，与清朝其他统治机构一样，也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而日益废弛和衰败，不堪一击。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将琦善、和春等人所率领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可算是清朝的主力部队，然皆次第为太平军所歼灭。这帮乌合之众，在对付“内乱”之时是如此的内强中干，在用近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更是软弱无能。不得已，清政府极力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凭借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与清军一起对付太平军，并为此在南北一些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吏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3月，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临行，他上奏请李鸿章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而作为年轻新进之士的李鸿章之所以毅然离别翰苑，返回家乡去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旅生涯，其动机和原因就在于：当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他办事衙门的高墙之内，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而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又促使他本能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要维护清王朝，忠于封建群王，加入到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开始其“宛转随人盖九年”的艰难历程。

当时的安徽是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地区之一：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彼伏此起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地主士绅们纷纷举办团练，与农民起义军相对抗。满怀信心从京城回

到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忧郁之情顿生。他虽然年轻得志，血气方刚，有意力挽狂澜，大干一番事业，但自己一介书生，手中无权又无势，无兵又无饷，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他怀着无可奈何的心境，先入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之幕。这时，太平天国忙于巩固南京外围阵地，势力尚未伸入安徽腹地，但安徽境内的捻军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之下，势力显得非常活跃，成为当地反清的主为军。针对这种情况，奉命“专司防剿”的周天爵以及已经成为他的幕僚的李鸿章等人，便把“剿办”皖北捻军、设法阻止其与太平军联合放在第一位。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随同周天爵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战役。一次是兴兵进“剿”定远陆遐龄起义。陆遐龄是安徽定远县荒陂桥旗杆村（今属长丰县沛河乡）人，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涉案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狱。1853年2月太平军攻克安庆，陆被解救出狱，并奉太平天国之命返回家乡定远组织当地群众起兵响应，不久即竖起“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等旗帜，聚众万余，打击土豪劣绅，抗拒清军。与此同时，夏金书起义军联络陆遐龄“约期大举”，南北呼应，声势较为浩大。充任合肥地主团练头子的李鸿章，首先率领团练百余人前往夏村将夏金书捕杀，并借机“增立东北乡团防”，以堵塞陆遐龄义军南下的通道。紧接着，李鸿章又与李鹤章督团随同周天爵在定远荒陂村、寿州东乡等地镇压了陆遐龄起义军，并设计捕杀了陆氏父子。于是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清廷赏六品衔。另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据《重修安徽通志》第102卷记载，捻军首领陈学曾、纪黑壮等聚众4000余人于颍州之王市集，官军多次进往“剿”办都未成功，而周天爵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督团堵“剿”

却获胜。不过，这期间，李鸿章尚未与太平军交战，只在本境依靠地主团练镇压势力不很强大的小股捻军，并且他只是起了出谋划策的作用。

1853年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李鸿章就从周天爵处调到李的幕府协办团练。此时，太平军已开始北伐之战。12月，太平军合围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湘军中一员勇猛儒将，曾国藩的至交好友。曾国藩曾分别致书江忠源和李鸿章，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无法冲破太平军防线前往救援，只是在庐州外围晋见率军来援的舒兴阿时表示：“我所带领的所有事先经过团练的壮丁，现今自愿准备粮饷，随同官军击贼而效力。”尽管各路援兵相继抵达庐州城外，但因将相间不和，各军无法统一指挥，清廷改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福济是道光进士，一个典型的贵族老爷，既缺乏应变才能，又不懂得用兵之道。由于师生的关系，李鸿章被召入幕，所部团勇也归福济辖制。庐州城内军民奋力死守，并得到援军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源源接济，多次主动出击，致使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力收复庐州。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的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强攻庐州的作法，采取先攻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的战略，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之路。

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战役，但屡屡受挫，加之封建官场中的互相倾轧、妒嫉，使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不得其志，颇受冷遇，但他牢记住其父李文安临终前的嘱咐：“我们父子几代深受国家的恩惠，太平军不消灭，何以为家？你们应当努力完成我的遗愿。”李鸿章决心忍辱负重，咬牙立志与太平军为敌。